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教材之十八

第七章 现代化与文化变革

# 社会现代化

(下 册)

北京大学 孙立平

第九章 科层制与组织结构的变迁

第一节 初级社会群体的衰落

第二节 科层制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科层制中的职员与科层制的“脱轨”现象

第十章 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流动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

第二节 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

第三节 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趋势

第四节 社会分层理论与我国社会分层

第十一章 城市化与现代化

第一节 城市化的过程

第二节 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编印

第三节 我国城市化的道路

# 目 录

- 第七章 现代化与文化变革**.....( 1 )
- 第一节 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 1 )
- 第二节 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建.....( 13 )
- 第八章 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24 )
- 第一节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24 )
- 第二节 人的现代化的条件.....( 41 )
- 第三节 民族性格与人的现代化.....( 53 )
- 第九章 科层制与组织结构的演变**.....( 69 )
- 第一节 初级社会群体的衰落.....( 69 )
- 第二节 科层制的产生与发展.....( 78 )
- 第三节 科层制的弊病及对新的组织结构的探求.....( 85 )
- 第十章 社会层次结构与社会流动**.....( 93 )
- 第一节 中产阶级问题.....( 93 )
- 第二节 开放性结构与社会流动.....( 100 )
- 第三节 我国社会流动增加的趋势.....( 108 )
- 第四节 社会分层理论及我国社会阶层分析.....( 116 )
- 第十一章 城市化与现代化**.....( 124 )
- 第一节 城市化的过程.....( 124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现代化.....( 135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化的道路.....( 143 )

第十二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及其制约条件.....(158)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成就及失败.....(158)

第二节 迟发展效果与迟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制约条件.....(169)

第十三章 西方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184)

第一节 关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理论.....(184)

第二节 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的理论.....(191)

第十四章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197)

第一节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197)

第二节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标选择.....(205)

第三节 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212)

( 26 ).....

( 27 ).....

( 28 ).....

( 29 ).....

( 30 ).....

( 31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37 ).....

( 38 ).....

( 39 ).....

( 40 ).....

## 第七章 现代化与文化变革

### 第一节 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

文化并不仅仅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凝结，它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文化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具体体现。任何人类的进步，如果不能积淀为人类的文化，这种进步是没有保障的。那不过是一闪即逝的流星。人类的进步只有积淀成文化，才能久远传递下去，成为人类的财富。

那么，从人类的整个历史来看，特别是在当今的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些趋势和规律呢？

#### 一、从同质性文化到异质性文化

随着人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也经历了一个从同质性文化到异质性文化的转变过程。

在传统社会中，文化的整合程度是比较高的。在那样的社会中，社会的规模比较小，社会分工不发达。因此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同质文化，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社会成员和那一部分社会成员所具有的规范、价值等，都是相似的。

但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社会规模巨大，人口众多，这就使群体社会生活的组织变得更为复杂。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分离，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加大，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就以娱乐活动来说，原始社会的人们不过是在劳动休息时，搞一些简单的歌舞活

动。而今天，电影、电视、音乐、广播、小说、诗歌等这五彩缤纷的文学艺术使得人们的娱乐活动内容大为丰富了，同时也就使得人们在娱乐方面的活动大大复杂化。

实际上，异质性文化的出现，不仅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性趋势，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原因在于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如同生物世界中的自然选择一样，文化的选择从总体上来说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尽管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理性的增强，对文化选择中自觉的成分在不断增加，但总起来说，文化的选择更多的则取决于某些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更确切地说，是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但是，任何选择都要以异质和多样为前提。没有异质文化呈现出的斑斓色彩，没有多样性提出的丰富可能，任何选择都会成为无源之水。相反，恰恰是异质与多样化，才赋予文化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以活力。这一点从历史上是不难看出的。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文明，已经有了大约七、八千年的历史。但是，人们追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的时候，却往往总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就在于，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第一次大放异彩的时期，而这种异彩恰恰是丰富的多样性撞击出来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犹如任何文化大勃兴的情景一样，是多种文化竞争和较量的结果。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群雄割据，大小百余侯国，又争夺又联合，合纵与连横相织，形成了历史上的多彩的场面。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状况为各种学说和流派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可能性。在其中，各种学说和流派都得以大展身手，最后形成儒墨道三家略占优势的局面。而从董仲舒开始的“独尊儒术”，乃是对这一异质性文化的选择。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开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在非集权则不能维护统一的时代，一枝独放的文化专制主义才能适应政治上的专制，而

自汉以后一直到盛唐的发展，无疑是文化专制与政治专制相结合的硕果。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唐代的多样性中寻找盛唐产生的原因，但实际上是把历史简单化了。可以说，文化专制主义作为文化选择的一种手段，儒家文化作为这种选择的一种结果，有助于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其能量也正是在盛唐以后才释放完毕。由此，这种神圣的文化开始成为包袱。而且，以文化专制主义作为手段而选择的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其优越性，但一旦其能量释放完毕，便显示出本身无法自我更新、发展的先天性弊端。因此，从中国历史上看，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中，随着各种外来学说打破儒家的大一统局面，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冲击，才使这种停滞的局面得以打破，从而出现了新的生机。而五四运动前后，恰恰是中华民族对文化的又一次选择。

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伟大文化创造，也正是文化多样性的产物。美国文化的勃勃活力，正因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的文化形成的一个拼盘。可以说，美国文化正是从这丰富的多样性中汲取了无尽的活力。

当然，古代文化中的多样化，与当代的异质性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古代的文化多样性，往往是与一个国家的分裂相联系的。相反，现代社会中异质性文化的发展，则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在现代社会中，异质性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各种各样的“副文化”（subculture）的产生。所谓副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为其中的一部分成员所共同分享的文化，如青年副文化、妇女副文化、中产阶级副文化、黑人副文化等。这些副文化虽都各有特色，但其核心价值观念，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大体上是一致的。至少不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这种副文化的价值观念与整体文化截然相对了，那么，这种副文化就变成了一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反文

化与副文化是不同的,反文化虽然也是为社会中的一部分成员所具有的,但其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念却是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相对立的。

## 二、文化的传播、冲突、适应、融合与文化的趋同

在第三章中,我们曾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孤立时代、多中心时代,而今天正在走向全球性社会的新时代。这就为我们分析当今文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在当今的全球性时代,一种世界文化正在形成。

根据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古远的年代,人们以原始群、氏族或部落的方式生存在一个极为有限的小社区中。这时人类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其生活的封闭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自身积累的成果。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影响也就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文化的发展往往就不再仅仅是自身积累的结果。相反,自身的积累与对外文化的转借,成了文化发展的两个基本来源。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inton)就曾指出,在今天各个文化的各种要素中,大约有90%是从传播而来的,也就是说,是从其他文化那里转借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较之文化的自身积累来说,文化的传播与转借,似乎成了文化发展的更重要的手段。

传播与转借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文化要素创造的一次性发生中看得出来。不错,有些文化要素的产生是一种多元发生的现象。比如在科学史上有名的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独立地形成了微积分的理论,达尔文与华莱士同时创立了进化论。但是,更多的文化要素往往是一次性发生,然后传播到其他文化中去的,比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由古代的中国人发明,中间经过中东地区,最后传播到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的。现在世界上许多语系中的字母文字,大都可以溯源到西奈半岛,只不过在后来传播的

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因此，在文化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中会有许多共同或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对这些共同或类似的因素寻根溯源，往往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而各种文化中的这些相同的或类似的要素，则是这个源头不断传播的结果。这种现象就好象在一盆清水之中滴入一滴墨水，这滴墨水会在整盆清水中传播、扩散一样。在文化研究中，曾产生过一种传播主义的理论，他们强调传播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虽然其中也有些学者，把文化的中心固定化，看不到各个民族对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最终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从而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但尽管如此，他们强调传播重要性的观点是应当受到重视的。马克思也曾经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保障”<sup>①</sup>。

但是，文化的传播与转借，往往并不是一种一帆风顺的过程。在这其中，常常要伴随着矛盾、冲突和斗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的程度如何，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发生联系和影响的两种文化各自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两种文化的个性越强，个性的差异越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冲突的程度也就会越激烈。相反，如果发生联系和影响的两种文化的个性比较相似，那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较小，即使冲突会发生，其发生的程度也不会过于激烈。这一点，从俄国与日本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俄国与日本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都曾经经历了一个转借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文化冲突远比俄国激烈。在日本，抵制西方文化甚至可以成为守旧派的旗帜。原因就在于，日本原来固有的文化，主要是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61页。



受古代中国的影响，是属于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较多的格格不入之处。相反，在俄国对外开放之前的文化，也基本上属于欧洲文化，至少说，有着欧洲文化的共同背景。因此，在俄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象日本那样严重的文化冲突。

由此可知，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将会出现较激烈的文化冲突现象，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一种很强的个性。因此，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经接触，就会发生激烈的文化冲突。近些年来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问题上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就是明证。问题在于，对这种文化冲突现象过于大惊小怪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文化冲突往往是由于转借其他文化中的有益部分而引起的文化发展与文化进步的前奏。就大多数文化来说，没有与外部文化的接触，没有文化冲突，就不可能有文化的进步。

在文化冲突之后发生的常常是文化适应过程。那么什么是文化适应呢？美国的雷德菲尔德、林顿、赫斯科维茨三位著名学者曾在1935年至1936年联合起草发表了《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他们为文化适应下的定义是：“文化适应是指一些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体集团发生长期而直接的联系，因而一个或两个集团改变了原来的文化模式所产生的现象”。换句话说，文化适应是指在两种以上的文化发生接触和影响之后，一种在吸收另一种文化的某种要素的同时，使自己的文化发生变化，从而使两者能够互相容纳的过程。这种文化适应从发生的直接原因来说是外部的，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引起的文化冲突，而从其发生的实质性过程来看，则是一种文化内部的复杂变化过程，是其内部结构的调整。因此可以说，任何文化的学习和转借，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借用过程，都不是在原有的结构中简单地加进一些东西。文化发展的实践表明，任何文化本身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要素之间需要具有一种相容性。所谓文化冲突就是在其他文化对一种文化造成冲击。被冲击

的文化还未来得及调适自己的内部结构、两种因素还未来得及建立起相容性时发生的一种现象。换句话说，这种冲突是一种暂时性的失衡。而文化适应则是对这种失衡的调节，通过调节使两种以上的文化要素建立起相容关系。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更加自觉地创造条件，有意识地、自觉地促进文化适应，以有利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文化适应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自觉的适应与不自觉的适应。在人类的认识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中，文化适应往往是不自觉地、缓慢地发生的，其中伴随着较多的痛苦和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才在不同文化要素之间建立起一种较为协调的关系。在人类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文化适应往往成为更加自觉的行为。这种有意识的文化适应表现为，这种文化适应是在政府支持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可以利用政府和舆论工具的力量对此进行宣传和解释，从而为文化适应创造条件。这种有意识的文化适应比之不自觉的文化适应，要更为迅速、更为顺利，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要少得多。

最后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传播、冲突、适应无论在其广度还是在其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而在这不断的传播、冲突、适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即全球性新文化的形成。

在当今的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的日益增多，为文化上的接触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则为文化接触创造了方便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接触、冲突、适应的增多，一个可以发现的趋势就是，各个地方的、民族的文化特色正在逐步消失。换句话说，经过文化融合和文化的重新锤炼，各个文化原来所具有的自己特有的光采正在黯然失色。各种文化之间，个性在减弱，共性则在增多。可以说，在越是古老、越是封闭的地方，这种不同文化的撞击越是激烈，地方文化面临的危机越是深重。而当这些地方要走上现代化道路时，其文化的激变

越是剧烈。

于是，在这种全球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文化的趋同。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中，各个国家和各个各族的文化的相似性正在增加。而当今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发生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在第二节中还要讨论。

### 三、文化的积累与历史的包袱

文化的传播与转借，只是文化发展的动因之一，文化发展的另一动因是文化自身的创新和积累。如果说文化研究中的传播学派重视的是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借的话，那么文化研究中的进化学派强调的则是文化自身积累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在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中，进化论的思想可以说源远流长。孔德、斯宾塞都是社会进化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在对文化的进化研究中，文化进化论的一个鲜明的观点是承认文化是发展、进步的。因此，文化上的进化论与那种认为人类文化是无所谓进步有否的周期性循环论思想，与那种认为人类文化是江河日下的退化论思想是截然不同的。进化学派则强调，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在进步，比如，泰勒就认为，宗教从万物有灵论到多神论最后到一神论，就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哈多则强调艺术的进化，他认为，艺术在早期阶段的特点是“现实的描写”，而后期阶段的特征是“几何图形的、象征的或抽象的描写”。萨林和塞维斯虽然在文化评价上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但他们也承认，“可以绝对地、客观地和勿庸讳言地确定”“文化中也有一般进步”，这种一般文化进步包括“全面发展”新水平的不断出现。并明确指出，文化的进化是以“组织性的增加、能量的较大程度的集中，和……增加了的异质性为标志的”。但他们又强调，所谓“进步”并不等同于“好”。举例来说，战争的进步表现为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和死亡人数的增加，战争时间的延长以及战争对人类社会后果的加剧。在这里，“进步”的意义

是“发展”，而不是“好”。

他们认为，文化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自身的可积累性。正如莱斯利·怀特所说的，文化是“一种符号的、持续的、积累的和进步的过程”。在这里，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是象征符号的使用。正因为象征符号的使用，人们可以把上一代积累起来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人，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人都加上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成分。如果没有象征符号的使用，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都要重新开始，文化的连续性和可积累性都是谈不到的，更不要说文化的进步。在这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数学为例，从历史上最早的数目概念的产生，到进位制的出现，到四则运算法则的发现，再到各种更为高级的、复杂的数学定理和公式的创立，就是人类对客观现象的数量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并积累的过程。如果上一代人不能通过象征符号（语言文字）将这种认识不断积累起来，传递下去，数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但是，作为一种比单纯的科学技术更为复杂的现象，人类文化的进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积累和增加的过程。就某一种特定的文化来说，已有的文化遗产既可能是伟大的宝库，也可能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趣的现象，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地球上曾产生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但有趣的是，这四个地方在今天都成为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残留的昔日的光彩以外，在今天远不是处于世界的前列。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理论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所谓循环论。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种生命周期，从其产生、发展到逐步衰败、灭亡，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反而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们找不到科学的答案。

著名科学史学家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结构的理论，也许可以为我們提供一定的启示。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呈现为“常规科学”和

“科学革命”两种形态。在科学的常规发展时期，人们在一定的范式的指导下，按照已有的框架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在这个阶段上，科学的发展主要是表现为数量的增加和深度的开拓。但这只是科学进步的一种形式。科学进步的另一种更重要的形式则是科学革命。在这里，关键的是范式的变化。库恩认为，范式在初期尽管可以顶住或溶化反常，推进常规科学的发展，但是当它扩展到一定的程度，生命力就会耗尽，愈来愈应付不了日益增多的反常。这时，旧的范式已经陷入危机，但由于范式本身的韧性，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千方百计地弥补漏洞。但危机继续加深，一直到新的范式取而代之。当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研究纲领”、新的“主题”、新的“蓝图”、新的“概念框架”等。正是通过科学革命，使常规科学量的积累过程中断，而将科学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库恩的理论是只就科学的发展而言，但我认为，把它应用于整个文化的发展，也是同样适合的。而当我们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文化的发展的时候，首先的要求就是不能把文化的发展看成一种纯粹的量的增加的过程。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量的增加与潜结构的变化交替进行的。在量的增加的过程中，文化的潜结构不发生变化，而是在这种潜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进行量的积累。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的遗产无疑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文化遗产的作用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真正推动文化这种结构变化的是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力，即它是否有能力打破旧的结构并建立新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遗产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倒会为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帮倒忙。这是因为，一种文化中的历史遗产越是丰富，这种文化的“韧性”（借用库恩的概念）也就越强；一种文化结构在过去取得的成果越是辉煌，它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在必须打破这种旧的结构以建立新的结构的时候，人们越是容易沉缅在它昔日的光辉之中，越是会具有一种侧隐和歉疚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遗产就会成为沉重

的包袱。从上述他们列举的四大文明古国以及其他的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来看，当其文化在原有的模式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之后，它们几乎无一不受过去的文化传统之累。当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的时候，过去的旧文化往往成为创造新文化的障碍。相反，在那些历史较短，没有悠久的传统的国家，新文化的创造反倒容易得多。这一点，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曾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但是当时代提出现代化的挑战，要求一种新的现代文化的建立时，这种传统的文化便开始成为障碍。

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人们屡屡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以及对现代化的障碍为何是如此的顽强有力？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韧性”。而这种韧性之强，除了一般的原因，起码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是这种文化并不单纯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而且也转化为种种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如转化为政治、经济等制度。应当说，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高度中央集权，与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多少年来我们又为这种文化加上了一种“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种种外衣，使其具有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对它的任何批评、怀疑和指责，都是不允许的。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被看成是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动摇。二是这种文化也内化为人的个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而是经过社会化过程，内化成为我们个性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深深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种价值观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与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遵循这种传统文化被认为是道德的、好的，而对这种文化的背离，都被看成是不道德的、坏的。这样，在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之外，又加上了一种道德上的神圣性。而且我们的文化又是一种耻感文化，而不是一种罪感文化，道德判断具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绝对性。所有这一切，无疑都大大加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韧性”，

从而使文化的更新和变革极为困难。

因此，要打破这种“韧性”，实行文化变革，除了进行社会体制的变革之外，首先是要打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和道德上的神圣性。这样，对文化进行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才成为可能。

#### 四、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各个要素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可以表现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之间，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增加很快，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却处于一种衰败的状态；这种不平衡性也可以表现在精神文化中的实体部分与其他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比如出版物的增加、电视机、录音机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文化的发展和高水平。

因此，文化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比如，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法的资本主义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封建农业国，全国分裂为三十多个各自为政的独立邦国。然而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却发生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和文学革命，涌现了象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伟大的哲学家，象歌德和席勒这样的文学大师。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sup>①</sup> 恩格斯也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sup>②</sup>

文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是由于各种文化要素除了它们的互相影响之外，还存在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比如，我们说，由于科学的发展水平低，宗教得以产生。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那么，为何现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相信宗教呢？据说现在世界上基督教徒就有九亿五千万人，伊斯兰教徒约有五亿五千万。这是由于宗教一经产生以后，就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虽然科学证明宗教的教义是荒谬的，但宗教仍然可以在社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3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85页。



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起作用。比如，统治阶级可以把宗教作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作为个人来说，尽管不信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但他可以把宗教作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寄托。此外，宗教还可以有一种社会整合作用。

文化的发展之所以会不平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各种文化要素的稳定性是不同的。比如，物质文化、认知文化，也都是比较活跃的因素，而价值观念、规范文化的稳定性就比较强。这样在它们的发展中，就会出现不平衡，有个叫做奥格本的人类学家就曾提出文化堕距这个概念，所谓文化堕距就是指“近代文化各部分并非是同速率的变迁，有些部分的变化较别部分为快，因之部分间有一种相关与相互依赖，当文化中一部分变迁较速时，需要各部分相关的文化也由变迁而得到重新调整……。如此文化一部分因发明与发现而首先变迁，且引起附属于它的若干部分文化的变迁。在变迁时，附属部分的文化常有一种迟延情形”。他提出有这种延迟现象后，遂接着说明脱节的实际内容：“我们环境的大部分是生活的物质条件，我们社会遗产的大部分是我们的物质文化。……使用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应用某些方法。这些方法之中有些简单到如象使用一个工具的技术，但更多的使用物质文化方式仅包括大部分的惯例与调整，如象风俗、信仰、哲学、法律、政府等。为了特殊分析的目的，这些调整的方式我们叫作适应的文化。适应的文化，调整或适应物质条件，是非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当物质条件变迁时，引起适应的文化的变迁。但适应的文化之变迁并非与物质文化变迁同时发生。有一种脱节现象直可拖延较久，有时甚至数年。”<sup>①</sup>

## 第二节 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建

### 一、一个时代的主题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

<sup>①</sup>奥格本《社会变迁》第200—203页。



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偶然的、具体的因素不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文化自身存在着比较深刻的危机，而向其他文化寻找出路的一种努力。

应当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并且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将中国引向衰败，但由于历史的惯性，由于以前的先进所奠定的基础，特别是由于当时中国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因此，危机仅是以潜伏的状态存在着。

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破了神圣天朝的神话，也打破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迷恋。在这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西方的文化也开始闯入中国的大门。正如鲁迅所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sup>①</sup>但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事变为中西文化的接触创造了条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是从对战争中中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的认识开始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是很难一眼洞察其间的优劣的，即使是其外化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也很难作抽象的直接比较。但是，长矛大刀与洋枪洋炮之间的差距，则是一较量就可见分晓的。正是这种较量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一直被骂作化外之人的洋鬼子还有一些“长技”。正如魏源在当时所概括的，“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于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兴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只认识到西方的物质文化是进步的，而没有看到其精神文化亦已远远走在了前面，这种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无疑是在密不透风的闭关锁国状态中冲开的第一条裂缝。正惟如此，它是难能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就在当时，也有人模糊地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某些优越之处。比如魏源就曾模糊感到，美国政府“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

<sup>①</sup>《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页。